

# 亚洲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

时家贤

(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容摘要：**经济增长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对于落后的亚洲国家来讲，制度因素，特别是制度创新至关重要。制度创新既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基础，又是亚洲经济增长的需要。制度创新是亚洲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动力和保障。

**关键词：**经济增长 制度创新

二战后，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让世界惊叹。对于经济增长原因的分析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学者认为，亚洲经济成功的秘密在于强势政府的干预，如青木昌彦。有的学者或组织认为，亚洲经济奇迹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果，如世界银行。有的学者则认为，亚洲的经济奇迹是要素投入的快速累积所致，如克鲁格曼。也有学者把东亚奇迹归功于儒家文化。本文则从制度层面对亚洲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一国经济增长是资本、劳动、技术、制度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或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各要素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对于落后的亚洲国家来讲，制度是各种要素的基础的基础，制度是聚合个体的黏合剂，是各种要素实现有效结合的关键；亚洲国家制度创新的轮动效应既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基础，又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更是未来亚洲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动力和保障。

## 一、制度和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传导机制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不断地为供应它的人民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建筑在先进技术基础之上，并且进行先进技术所需的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sup>[1]</sup>。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贯穿于经济增长的各个维度之中。制度制约着经济增长动力的整

合、规模的大小、结构的状况、速度的快慢、质量的高低。但制度本身并不等于经济增长，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是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实现的。这些传导机制包括：社会环境、激励机制、市场运行、经济需求、利益和谐，等等。

### （一）制度——社会环境——经济增长

制度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适宜的环境和框架，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制度的作用在于能够创造高层次的生产要素的环境，在于能够创造各种生产要素充分发挥作用的环境，从而影响社会经济增长。“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实际上制度是个人与资本存量之间，资本存量与劳务产出及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sup>[2]</sup>也就是说，制度可以通过确定的制度安排，规范人们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提高交易信息的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 （二）制度——激励机制——经济增长

制度提供了激励机制，增加经济活动的动力，从而提高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制度可以通过对财产权利和知识产权提供保护，促进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的涌现，来推动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制度可以通过明确界定的产权来明确权利与责任的划分，确保权利与义务配置得当，以充分调动每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经济增长。

### （三）制度——市场运行——经济增长

制度可以通过正规的法令规章和正规的行为准则等来塑造微观主体的行为，也可以通过非正式制度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如惯例作为人们在市场活动中多共同遵从和认可的已接近正式约束的非正式约束，就自动调控和规制着人们的交易与交往活动。通过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约束，来影响市场经济的运作、促进了市场的成长、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

### （四）制度——经济需求——经济增长

经济世界是由无数的个体构成的，开发每个人的需求欲望会推动经济增长。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制度能够刺激人们的需求。例如，非正式制度对需求水平和需求结构的影响。“哪怕仅仅是纯粹没有形成惯例的习俗的存在，在经济上也可能具有深远的意义。尤其是经济需求水平——一切经济的基础——最广泛由纯粹的习俗所决定”。<sup>[3]</sup>

### （五）制度——利益和谐——经济增长

制度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刺激结构，引导经济发展的方向。诺思在《西

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通过利益的和谐，促进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减少外部经济效应，达到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和谐，人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和谐，确保社会的稳定，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反过来，经济增长动力的整合、规模的大小、结构的状况、速度的快慢、质量的高低又会促进制度的变迁。经济增长会引起社会环境、激励机制、市场运行、经济需求、利益和谐关系的变化，从而提出制度创新的要求，推动制度不断完善。

## 二、亚洲国家的制度创新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基础

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方面，它是现代经济增长非同期性的具体体现。现代经济增长发端于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19世纪中叶开始向欧美的其他国家扩散；在19世纪末登陆亚洲的日本，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才在非欧文化居主导地位的地区发生。另一方面，它又是现代经济增长绩效非均衡性的具体体现：有的国家增长很快、有的国家增长很慢，有的国家一直快速增长，有的国家只是快速增长了10年或者20年。例如，富裕国家的经济在1960~2000年间以2.7%的速度快速增长，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和80年代初都经历了快速增长，增长率分别为达到2.9%和2.3%，但随后却戏剧性地衰落了。拉丁美洲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里严重下滑，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定程度的回复，但一直处于“贫血”的状态。只有亚洲是唯一的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来一直保持快速发展的地区。<sup>[4]</sup>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世纪80、90年代，韩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生产力水平明显比其他国家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21世纪头10年末，中国又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亚洲经济增长，得益于亚洲国家的制度创新。具体表现在：

### （一）亚洲的经济增长得益于亚洲国家的制度重塑

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起飞，20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还是20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虎”的后来居上，无不是制度重塑的结果。“为了越来越多地依靠个人的积极性和对外开放，经济快速增长的东亚国家都重塑了各项制度”。<sup>[5]</sup>如在贸易制度上，亚洲国家选择了出口导向，而不是

进口替代；在经济制度上，亚洲国家选择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在社会制度上，亚洲国家选择了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例如，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明治政府作为制度的供给体，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而且采取强制变迁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全力推进它的建设。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日本经济都得益于明治维新时期所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sup>[6]</sup>而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经济的腾飞则得益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 （二）亚洲经济增长得益于亚洲国家制度创新的继起性或轮动性

亚洲国家制度创新的继起性或轮动性，维持了亚洲经济几十年来的高速增长。20世纪50~60年代，战后日本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选择适宜的市场经济制度，很快使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高速发展，从而掀起了亚洲经济快速增长的第一次高潮。20世纪60~70年代，以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建立适宜、有效的制度体系，迅速走上工业化道路，掀起亚洲经济快速增长的第二次高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中国、东盟国家和地区为主体，通过制度创新，发展经济，掀起亚洲经济增长的第三次高潮。如今，中国和印度经济的腾飞，又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新支撑点，靠的也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的快与慢、制度创新起步的早与晚，都影响着亚洲经济的增长。

## （三）亚洲经济增长得益于亚洲国家市场经济制度模式的多样性或差异性

东亚经济起飞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在重塑制度时并没有严格地按照标准的行为准则（如华盛顿共识）的要求重塑自身的制度，也没有照搬英美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从各国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选择制度，逐渐形成适合本国特色的制度模式。如日本的“集体协调的市场经济”模式、韩国的“权威协调集体行为的市场经济”模式、新加坡的“法律规制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sup>[7]</sup>正是这些不同的模式，造就了各国不同的经济活动协调机制，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亚洲经济的持续增长。

## （四）亚洲经济增长得益于亚洲国家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建设的并进性

正式的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则，如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公共财政制度、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非正式制度是人类在适应稀缺世界的过程中，经过长期的试错过程与经验积累而成的，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内容。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基础和前提，非正式制度通过对正式制度的补充、拓展、修正、说明和支持，成为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标准。非正式制度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因而非正式制度的形成与变化往往滞后于社会环境的变迁，而且社会

变化的越快，这种滞后性越明显。所以，亚洲国家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都非常重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结合。例如，日本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非常注重社会习惯的作用。如日本人至今仍然很重视建立长期的比较固定的关系，日本企业与员工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也存在着长期固定的关系。日本企业的经理与普通员工之间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比较小，等等。韩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非常重视韩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因素的作用，如1968年，韩国颁布的《国民教育宪章》规定，教育的目标应着眼于人的道德修养、理性的崇高、个性的丰满和精神的健全，注重培养人的创新意识和精神，培养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而中国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则更注重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等等。

### 三、亚洲经济的未来有赖于亚洲国家制度的不断创新

无论是阐述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还是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践都表明，制度或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但制度不是万能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有一个生命周期的问题，永远适应经济增长的永恒的制度是不存在的。亚洲也不例外。随着亚洲经济增长，亚洲国家制度进一步创新已势在必行。

#### （一）制度不断创新是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

随着经济增长，制度诸要素或结构必然随时间推移、环境变化而发生的改变。经济增长的本质在于全体国民的人均收入都有所提高。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会发生变化。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其他根本性变化也会随之发生：市场化程度、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制度的变化、家庭内部行为的变化等等，从而要求规范人的经济行为的制度、调整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制度、协调个人和企业之间关系的制度等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也就是说，在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原有制度将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制度的稳定就演化为制度的僵化，由此将阻碍经济增长，形成制度创新的压力。同时，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上会出现新的利益集团。这些新生利益集团必然要求从制度安排上保护自己既得的利益；必然要求对具有效率的权利进行界定；必然对社会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进行规定；进而改变制度结构，促进制度创新，出现新的制度安排。

#### （二）制度不断创新是防止“制度疲劳”的需要

随着经济增长，社会经济环境会发生变化，原有的制度质量逐渐恶化，制度的效率会递减，而国家或政府却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革以精简它的制度而使其

更具普适性和更少歧视性，因而出现“制度疲劳”。杉浦哲郎（2002）指出，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经济结构的“制度疲劳”。在他看来，由于经济全球化与技术革新的进展，从高速增长期到20世纪80年代末支持日本经济增长的各种制度变得与时代的步调不适应了，从而引起日本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如“终身雇佣制”、“年功序”、“企业内工会制”等，这些制度在日本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发挥了威力，但是当它变成一种僵硬的模式后，则变为企业调整经营和降低人工成本的障碍，导致经济发展的滑坡。<sup>[8]</sup>

### （三）制度不断创新是解决目前亚洲经济问题的需要

亚洲经济增长虽然令人瞩目，但经济全球化问题、贫困化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对世界市场的过度依赖问题、经济波动问题等不断释放变革制度的信号，如贫困化问题。亚太地区的快速经济增长帮助减少了极度收入贫困，但在解决婴儿死亡率和广泛存在的饥饿方面收效较小；经济增长与改善人们福利之间关系并没有得到有效处理。再比如，老龄化问题。未来十几年里，亚洲国家将先后转入人口负担时代。而从世界范围内看，从老年化社会到老年社会，德、英、美、法分别经过了40年、47年、73年和115年；而日本只经过了25年；预计新加坡、韩国只需20年；越南仅要15年；且大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进入人口负担时代时的人均GDP与欧美相比不是很高，也就是说在亚洲国家在不太富裕时就进入了这一时代。这不能不对现有的制度提出挑战。

### （四）制度不断创新是维持未来亚洲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

已经经历了几十年增长的亚洲经济，未来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问题。区域经济合作将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大势所趋。而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创新将是未来亚洲经济的发展动力。因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合作机制，是东盟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组成的三个“10+1”机制，还是东盟与中、日、韩三国组成的“10+3”机制，或是“10+3”再加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三国的“10+6”机制，遇到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合作的制度化的问题以及制度的区域协调的问题。这都取决于各国在制度创新上所作的努力。

## 四、几点启示

### （一）世界上没有一经制定永世适用的政策制度

对于处在全球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加快背景下的中国来讲，情况更是如此。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

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的生命周期明显缩短，需要适时开展清理，以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瞬息万变的需要。中国应利用后发优势，吸取日本制度创新的经验与教训，加速推进中国各项制度的配套改革，避免出现“制度疲劳”。

## （二）一个国家能否做出有效的制度安排关键在政府

绝大部分正式的制度安排，或非正式制度作用的发挥，都取决于政府的理念、政府的行为、政府的能力以及政府的稳定性。因此，政府本身的制度创新是重中之重。同时，要把政府力量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结合在一起，形成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发展的“合力”。

## （三）注重非正式制度的变革

一个国家制度创新的成功与否，与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在变革的速度上有快有慢，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非正式制度的改变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正式制度只有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在制度的可移植性方面，一些正式制度尤其是那些具有国际惯例的正式制度可以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如市场规则、交易法则、贸易制度等，但价值观念、习惯、意识等这些非正式制度由于受历史文化传统的制约，其可移植性就差得多，即使能够移植，它也比正式制度要困难得多。因此，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习惯、意识等更多的需要国内建设。中国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 （四）中国未来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制度性挑战

这里要把经济增长的启动和经济增长的维持区别开来。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只需要一些有限的打破常规的改革，而这些改革对一国经济的制度能力并无过高的要求（这就是有些国家，如中国和越南并没有系统的制度改革却保持较高的增长的真正原因所在）。而经济增长的维持却要困难得多，因为经济增长的维持要求建立起一个健全的制度基础，以赋予经济抗御各种冲击的能力，并保持生产的活力。中国经济增长的启动阶段基本完成，维持持续增长将成为中国今后的主要任务。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于制度性挑战：一是与保持生产的活力有关的制度的转变；二是与加强冲突管理有关，更大的挑战是来自法律和政治领域的制度性转变；三是来自制度区域协调的挑战。

### 注释：

1. (美) 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研究结果和意见》，载《现代经济学文选》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4页。

2.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226页

3. (美) 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研究结果和意见》，载《现代经济学文选》

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4页。

4. 丹尼·罗德里克：《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5.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58页。

6. 金明善、车维汉：《赶超经济理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6页。

7. 左大培、裴小革：《世界市场经济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2页。

8. 如何看日本“病”与中国“强”，《环球时报》2002年10月10日第4版。

##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sian Economic Growth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Shi Jiaxian

(Professor of Marxism College of Liaoning University)

**Abstract:** Economic growth is the result of many factors working together. Institutional factors, especially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re vital for latecomer Asian countries. It is not only the basis for Asian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the need of Asian economic growt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s the motivational force and guarantee for Asia to maintain its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